

對香港政府高教的期望

郭位

香港城市大學校長

過去 20 年，香港整體教育的理念改變不大。以高教而言，除了 UGC 資助的大學於 2012 年由 3 年改制為 4 年之外，蕭規曹隨，無視早已更新的英國高教，仍然亦步亦趨踩著港式英制殖民時代的腳步。

執世界高教牛耳的美國，其大學自主、教研並重、多元化、孕育創新和鼓勵創意等關鍵因素至今未必深耕香港。

精簡權責

學術自由指的是從事學術教研的自由，政教（育）分離確保師生專心致志，不受外力干預。限制或誤用學術自由，不僅抑制知識交流，更會窒息創意和封閉創新。以美國為例，川普總統就任後，推出政令，限制七個穆斯林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。幾十位大學校長聯名，要求政府收回這道行政命令，因為它阻礙了學術交流。

大學和醫療、金融、軍警、...等專業一樣，擁有自己的文化並執行獨特的運作方式。大學自主，學務由教授主導，校務由院長、系主任、...等學術主管各司其職，分層負責，外力莫入。大學經費來自政府撥款、社會捐助、學費收入、研究資助、投資收益等多重管道；隨著市場機制，大學調整教研活動，各管道佔年度經費的比例隨之波動，各校有異。大學之上，依構成不同，由校董會或教育主管單位單線全權規範大學。精簡權責，少牽制、多創新，美國州立大學的校董會成功運行，政府、私人、校外機構等其他個體不再藉故左右大學。

公平競爭

大學先進的另一要件是合作、評鑑、競爭。美國的大學之所以出色，公平競爭是一個要素。有人嘲笑他們過於注重體育，可是體育面最厲害的大學正是教研首屈一指的史丹佛大學。史丹佛的 35 支校隊，每年花費一億多美元。

其爭也君子，體育競技強調團隊精神，反映了成效導向的誘因，此與大學吸引多元化的人才、引領科研和募集研究資金的做法相輔相成，一致無二。

評比之下才可能了解、修正教研方向，進而達到學術卓越、導引社會面向未來，而公平競爭就是執行這些學術活動的必要條件。

人才挖掘

以質量創新為先進標竿，香港高教大致可從以下兩點求取改善：

其一，術業有專攻，有影響力的人喧賓奪主喜高談闊論高教事務，情緒化的社會動輒牽制大學學術行政。香港雖然不是政治摻和高教嚴重的地區，但是多少基於華人社會的傳統，空虛的口號太多，重地域性，輕多元化，產官學糾纏不休，有礙創新；

其二，除了政策擬定由外行主導之外，政府主觀地以職場現況做為規劃高教的座標，過度重視學生就業安置，完全忽視人才挖掘（cultivating）的時代性，最終浪費社會資源，流失優質的人力資源。

資源投入

亞洲四小龍中，高教現代化起步最早的台灣先馳得點，於上世紀 80 年代引進重研究的美制。可惜外行主導，台灣誤解教授治校的真諦，加以政府濫情，民眾民粹，在過度政治化的考量下，廣設大學的決策重創高教，至今欲振乏力，社會喧鬧，高教敬陪四小龍之末座。做為金融國際化先進的香港，在港英管治之下，高教起步略晚，法規嚴謹，不敢作為；由於大學數量偏少、規模偏小，表面上政府投入資源集中，單位大學的資金尚佳，目前落後新加坡，居四小龍第二。

然而此起彼伏，香港守成有餘，科研投入佔全港 GDP 之比重遠遠落後世界，墊底於四小龍。近 3 年來，香港已有一些優秀的教授棄港校、轉往大陸的大學就職，同時大陸中學畢業生申請入讀港校的人數也大幅縮少，這些值得警惕的現象在幾年前簡直不可思議。

不進則退，除非落實高教，否則企圖心強、大力投入高教的南韓將在 5-10 年內取代香港，躍居四小龍之次席，香港將退居第三。

遠離納管

香港的大學雖然在某些國際排名上進步，但是高教並非政府施政重心，心件不彰，創新乏力，邊際效益有限。

值新政府開張之日，寄望當政者能夠審時度勢，將節省而不必支付的軍事花費（可達全港年收入的 20%）提成投入科研。政府主導高教政策，資源分配應該扎根高教文化，以全港整體教育的成效為目標，參考美國高教，檢討現行政策與執行方式，剷除利益衝突，遠離微管，更絕對不可納管（nano management）。

政府及特定利益團體或個人不得橫加干涉大學事務，切勿口惠不實、無心吸引國際學生。目前香港的大學普遍缺乏學生宿舍，就是一個令人失望的現實例子。唯有拋開殖民地重規章、貶創新的買辦模式，導引、扶持新興學科的開拓，為年輕人創造嶄新的就業環境，香港才有資格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下續稱一流。

註：本文針對香港高等教育，陳述的原則可供大陸、台灣參考適用。讀者可參閱 2016 年香港商務《高等教育的心件》一書（台北天下文化版《高等教育怎麼辦？》，北京中信版《心件：大學校長說教育》）。該書版稅捐做學生獎學金。